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 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 16 冊

周達觀《真臘風土記》研究
——十三世紀末中國華人的域外訪察與文化交流

何修仁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周達觀《真臘風土記》研究——十三世紀末中國華人的域外訪察與文化交流／何修仁 著——初版——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民99〕

目 4+254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編：第16冊）

ISBN：978-986-254-154-8（精裝）

1. 文化史 2. 文化交流 3. 遊記 4. 元代 5. 柬埔寨

738.421

99001912

ISBN - 978-986-2541-54-8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 編 第十六冊

ISBN：978-986-254-154-8

周達觀《真臘風土記》研究
——十三世紀末中國華人的域外訪察與文化交流

作 者 何修仁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總 編 輯 杜潔祥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0年3月

定 價 十編 20冊（精裝）新台幣 31,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周達觀《真臘風土記》研究
——十三世紀末中國華人的域外訪察與文化交流

何修仁 著

作者簡介

何修仁，1964年生，台灣屏東人，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畢，現任職國立聯合大學華語文學系。主要研究方向為：華人社會與文化、中國文學、中國藝術、多媒體與華語教學、寫作學。出版專書《美術鑑賞》、《旅遊與藝術欣賞》、《吳哥窟－叢林裡的眾神之城》、《中國藝術欣賞入門》，散文集《法雲》、《禪歌》、《九十九朵曇花》、《印象山城》等，並發表多篇學術論文。

提 要

十三世紀末，亞洲的中國版圖主要由蒙古人執行實際統治權，這支具有外拓性格的游牧民族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的正統朝代：「大元」，並展開對海外征伐、探索與貿易活動。其中，征伐東亞及東南亞的行動均以失利告終，但在探索活動中，元朝則產出中國地理文獻的關鍵性報告，足以反映當時中國華人對域外的訪察與文化交流現象。

其中，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為關鍵代表作。周達觀在一次官訪的行動中抵達真臘，停留約一年時光，返國後撰成此書，保留當時中、真之間的交流情況。《真臘風土記》成書以來，在中國引起的迴響不大，因此《元史》不記錄周達觀本傳，但《真臘風土記》卻在近代歐洲引起重視，以其是柬埔寨古史唯一書面資料，法國考古學家並因之重新發現吳哥古文明遺跡，價值不言可論。

《真臘風土記》全書計四十則，充分記錄真臘一地風土，並提及與中國的貿易關係，反映周達觀的思維觀點。經由梳理詮釋，得以釐清當時中國華人對異域的看法，並瞭解當時周達觀出訪使團的主要任務，乃在於貿易訪問考察。從中也得以理解貿易現象的本質觀察與活動，主要將以文化交流為主軸，這有助我們觀察、探究七百年前中國華人社會的思維模式，經由傳統文獻提供的檢索，更多層面地提供當代的反省。



目

次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中國華人的域外觀察與拓展	1
第二節 研究方法——文獻整理與實地印證	8
第二章 公元 1297 年前後中國的時空背景	15
第一節 以蒙古族入主的元朝時代	15
一、國際探索與漢化	15
二、階級與文化交流	22
第二節 忽必略時代	26
一、漢化與對外拓展	26
二、東南亞的征伐行動	29
第三節 鐵穆耳及其東南亞作為	31
一、守成政策	31
二、八百媳婦國	33
第四節 傳統漢華文化觀點與周達觀	39
一、中國文化觀點	41
二、傳統的周達觀	45
第三章 周達觀與《真臘風土記》的初步討論	49
第一節 周達觀其人	49
一、時代	49
二、家鄉	51
三、職業	52
四、交遊	54

五、著作	56
第二節 《真臘風土記》其書	56
一、著作年代與記錄對象	57
二、價值	60
三、章則架構	64
第三節 相類著作比較	65
一、《諸蕃志》	66
二、《島夷志略》	68
三、《馬可波羅遊記》	71
第四章 《真臘風土記》梳理論述（上）	79
第一節 城市與建築	79
一、城郭	79
二、宮室	93
第二節 人物與風俗	96
一、服飾	96
二、官屬	99
三、三教	102
四、人物	107
五、產婦	111
六、室女	114
七、奴婢	120
八、野人	123
第三節 語言與時序	125
一、語言	126
二、文字	129
三、正朔時序	132
四、爭訟	139
第五章 《真臘風土記》梳理論述（下）	145
第一節 山川與出產	145
一、山川	145
二、耕種	147
三、出產	151
四、草木	156
五、飛鳥	158
六、走獸	160

七、蔬菜	162
八、魚龍	163
九、貿易	165
十、欲得唐貨	168
十一、醞釀	170
十二、鹽醋醬麴	172
十三、蠶桑	174
第二節 器用與軍馬	176
一、器用	176
二、車轎	179
三、舟楫	182
四、軍馬	184
五、國主出入	187
第三節 其它	192
一、病癰	192
二、死亡	196
三、屬郡	199
四、村落	200
五、取膽	202
六、異事	203
七、澡浴	204
八、流寓	206
第六章 以周達觀為典型的華人域外觀察與交流	209
第一節 對次文明的觀察	209
一、華夷之辯	211
二、次文明觀察	215
三、心態與想法	222
第二節 儒士的出發角度	225
一、儒士觀點	226
二、真臘的美俗	230
第三節 海外貿易的風土考察	234
一、元朝對外貿易與周達觀出使	235
二、貿易現象背後的本質考察	238
第七章 結 論	243
參考文獻	251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中國華人的域外觀察與拓展

當我們觀察人類在地球上的活動時，顯而易見的現象是：文明或文化的發展始終不曾局限於一時一地。一旦人類擁有較為穩定的生活基礎，他們總會將探索的觸角延伸到每個可能的區域。當然，這個過程有時成功，有時失敗；人們有時以自己的文明影響及於異域，有時也不可避免受到異域的影響。在這樣的交流中，文化發展出多元與多樣，進而構成人類文明的豐富性。

文化的交流方式自然有各種可能，無疑也充滿各種變化，不過，歷史上最常見的方式則是透過軍事的征服，或是貿易的往來，最能構成不同種族或文化間的交流。這種情況，古今中外皆然。

中、西方的著例甚多。以軍事征服而言，著例如馬其頓人亞歷山大的東征，〔註1〕造成歐、亞、非三洲之間的影響互動；以貿易往來而言，著例如中國漢朝早已開闢的絲路，〔註2〕造成東、西方的貨品傳輸與交易。這些定然都對人類的文化交流產生重大影響，進而造成自身文化的質變現象。

〔註1〕從古希臘阿里安所著的《亞歷山大遠征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1年）一書大約可以整理得出：亞歷山大約於公元前336年即位，兩年後出征波斯，隨後一直沿地中海南下，攻占埃及。公元前331年往東征伐波斯本土，並一直攻打到印度的西北部。在回兵的路程中，於公元前323年病死於巴比倫。亞歷山大所締造的疆域之大，為歷史少有者。

〔註2〕許多學者認為，中國在漢朝前已有絲路。例如楊建新先生《絲綢之路——歷史上的歐亞大陸橋》便認為：「在張騫通西域之前，中國的絲綢已經傳入西方。這在古希臘人的著作中已有所反映。」（臺南：復漢出版社，1993年），頁4。

本書探討的主題，正是發生在十三世紀末時中國人對域外的觀察及文化交流活動。更細部的論述，集中在「周達觀」此一中國華人〔註3〕在今日東南亞柬埔寨的觀察活動，討論的重心則置於當時兩個區域間的訪察及其得出的文化交流現象。

選擇十三世紀末的中國作為討論對象，大約有幾個原因：

首先，這段時期屬於中國朝代分期上的「元朝」，這個時代在中國歷史上有極其特殊的性格及代表性。大致來說，元朝的基本性格是一種游牧的、外拓的、較為重武輕文的統治型態。從成吉思汗（公元1162年至1227年）開始的蒙古國，便憑藉武力開疆拓土，拉近了不同區域間的距離，最後，元朝擁有相當驚人的成績，疆土之大，實為中國歷史之冠。宋濂等人編修的《元史》卷五十八〈地理志〉提及的元朝疆域大約是：

北踰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

元東、南所至不下漢、唐，而西、北則過之，有難以里數限者矣。

〔註4〕

由此來看，元朝版圖至少超越漢、唐不少。事實上，最大版圖時期的元朝疆域應該還包括俄羅斯的西伯利亞、東南亞北部等地，不論就古今而言都是超級的大國。

能夠形成如此廣袤的疆域，勢必與蒙古軍的強大軍力有關。以軍事的作戰能力而言，蒙古軍的驍勇強大是無可懷疑的。然而，蒙古人從馬上得天下，卻未能在馬上治天下，或無法維持長久的政權，卻也是歷史早有的定論，正如黃仁宇先生在《中國大歷史》一書所說：

從成吉思汗率領蒙古騎兵東征西討，到忽必烈征服南宋，建立元朝，蒙古軍隊幾乎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但是如何經營這個雄跨歐亞的大帝國，忽必烈及其繼承者仍是以「馬上」得天下的精神治理這個

〔註3〕「華人」一詞，泛稱義為指中國華族，或是後來以漢族為基礎的「漢人」，到了唐朝以後，也常稱為「唐人」。它們在意義上可能有較細微的分別，但整體來說，華人、漢人、唐人在指涉上是近似的，指的是在中國這塊土地上，一支傳承最久、最大的民族。其中，「華人」的指涉義最為廣泛，所以本文統一使用「華人」一詞，但在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一書中，則通常使用「唐人」一詞，其實意指相同。引述周達觀原文時，我們保留「唐人」一詞，但在梳理時則通常使用「華人」一詞。另外，依文意需求，也使用「漢人」一詞。

〔註4〕〔明〕宋濂等撰：《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360。

國家，重武功而輕文治，以至於制度無法上軌道，改革也無法落實。

九十年後，這個中國史上空前的大帝國被明朝取代。〔註5〕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元朝國祚不長，但因領土呈現較大範圍擴張情勢，其中必然牽涉、反映許多相關的層面及問題，例如當時中國與外國的關係消長，及其中可能產生的影響、變數等，這些都將直接或間接影響周邊國家，進而造成地理疆域更動，或是文化融匯等現象。由元朝的朝代性格，可以得出合理的假設，即以這麼大範圍的擴土行動，元朝理應企圖將今日的東南亞併為中國的國土。併為國土的方法，可能是透過最直接的軍事征服行動，也可能是經由貿易進而掌握、控制對方經濟等，在這點上，均和本文所討論的核心對象：周達觀《真臘風土記》的產生有直接或間接的關聯。

其次，十三世紀末時是中國航海科技的高峰期，經由宋朝的科技奠基，元朝已經繼承、發展出極優良的航海技術，這種技術，提供了與陸地征伐相異的交通型態。蒙古軍本由游牧起家，擅長草原奔馳，然而，當他們擁有中國之後，續而發現中國以外的東方及南方區域，那是一片必須橫越海域的另類國度，如果能征服這片海域，相對是國土的更遼闊進展，其中，扮演最關鍵的條件之一便是航海的技术。

事實上，蒙古軍消滅宋朝後，自然接收宋朝的政權，以及相對而來的所有一切資源，包含漢人長期以來在造船、航海技術上的成果。從資料顯示，十三世紀初的宋朝時期，中國已經是世界上擁有最好船舶的國家了。美國學者 Louise Levathes 在《當中國稱霸海上》一書中說：

13 世紀初，中國擁有印度洋上最好的船舶，所以從阿拉伯人手中奪走了大部分的海上貿易。遠洋商務帆船平均大約 100 英尺長，25 英尺寬，載重量 120 英噸，以及水手 60 名。最大的船可載 300 英噸的貨物加上 500 至 600 名人員，而且拖著救生艇。在設計上，船底變窄有如刀鋒一般，以便在海上船行時能夠乘風破浪；船首和船尾的空間都空下來，以增加航行的速度。〔註6〕

這樣的成就不可謂小，在載重量及設計上都已臻至成熟，而這時大約是在南宋時期便有的成就。不久後，元朝忽必略（公元 1215 年至 1294 年）攻滅南

〔註5〕黃仁宇：《中國大歷史》（臺北：聯經出版社，1994年），頁191。

〔註6〕〔美〕Louise Levathes 著，邱仲麟譯：《當中國稱霸海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30～31。

宋，在政權改異之餘，也繼承了其它相關的製造技術。正因為忽必略擁有如此精良的航海技術，他的企圖心自然放眼海外，蠢蠢欲動。Louise Levathes 接著提及：

忽必略大汗在征服宋朝之前，就已經有侵略日本的意圖。在至元十一年（1274），他組織了一支 900 艘船、4 萬名士兵以及 1.5 萬匹戰馬的大軍，發動對日本的侵略戰爭。〔註 7〕

這次的侵略戰爭並沒有成功，但忽必略卻不死心，數年後又發動更大規模的海上行動：

經過 7 年的準備，忽必略組織了一支比上次更為龐大的新艦隊。這支武力擁有 4500 艘船和 15 萬名士兵，在當時是世界上最空前的大部隊。〔註 8〕

本文無意討論忽必略與日本的對仗及結果，但從中顯然已透露出一個訊息：既然元朝政府擁有良好的武力，包括陸上與海上的技術，加上「開疆拓土」的基本國策，他們勢必進行許多的域外探索與攻擊行動。然而，從忽必略對日本兩次海上征伐的行動均以失利告終的情況下，元朝政府勢必也會從中得出其它反省，即對一個異域國家的征伐，可能需要更全面的準備措施，例如對這個國家的更詳細瞭解等。由此不難想像，當初元朝政府必然也派遣許多類似「使者」、「間諜」的人物，對域外展開各種探索活動。

周達觀正是這些域外考察者之中的一個。

然而，今日從《元史》一書來看，並沒有周達觀的傳記，可以推知，周達觀只是當初眾多類似人物中的一個，並不具有絕對的重要性。有趣的是，周達觀因為當初一次執行出使訪察的任務，卻意外保留下來一部著作，即《真臘風土記》，此書間接影響後世的考古學，成為在這個領域的絕對參考著作，這恐怕不是周達觀當初所能預想。

從周達觀及當時更多的人物對中國域外的訪察行動，延伸而來的課題必然會牽涉更深一層的對文化的觀察。觀察過程中，他們也必然會進行一種中國文化對另一種非中國文化的比對探討，也必然會透露他們對自我文化及異域文化的認知與判準，這些，都有助我們對中國文化的解讀，提供更全面的資料。

〔註 7〕〔美〕Louise Levathes 著，邱仲麟譯：《當中國稱霸海上》，頁 39。

〔註 8〕〔美〕Louise Levathes 著，邱仲麟譯：《當中國稱霸海上》，頁 44。

因此，我們有必要對「文化」，尤其是中國文化的意涵稍作說明，它在許多層面影響周達觀的思維，而周達觀也將之運用於對待他人的思維。

文化的涵蓋層面無比廣泛，所有人類的活動歷史，及其在歷史進程中的各種實踐與表現，都可納入文化的範圍，所以「文化」一詞自然無法嚴格定義。但就普遍意義來說，文化至少指的是一種社會意識的呈現，它會表現在思想、文學、藝術、風尚、宗教等各個範疇，而不同種族也會產生不同的文化，彼此之間，他們或有關聯、或有相似，卻也不乏無關或相異之處。不同文化之間，往往產生比較、協調、對抗等種種現象，構成文化差異性的複雜難解，也出現多元文化的豐富性。

至於中國文化，以其發展歷史悠久，早就呈現與其它文化的差異性與獨特性。中國典籍中較早而有代表性的對文化的說明文字，可以《周易·賁卦彖傳》為代表：

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註9〕

強調文化的特色是：「人文以化成天下。」這裡，文化指的是一種特定的活動，並且應該與統治階級有關，從文義來看，《周易》的著作者已有一套既定的思維或規矩認定，屬於狹義的詮釋，這種狹義的文化詮釋與今日普遍性的、廣義性的文化定義略有差距。也就是說，當時人們並不認為任何層面都屬於文化的範疇，「文化」的概念只停留在政治階層的統治觀點中。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以人文化成天下的概念，在中國後世持續不斷發揮影響，成為文化的主流定義。漢朝人劉向在《說苑·指武》中說得更清楚：

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

然後加誅。夫下愚不移，純德之所不能化，而後武力加焉。〔註10〕

認為人民如不遵守掌政者的「文化」規定，則必須以武力征服，令其遵守既定概念的文化，凡此說明中國古代對文化的定義，往往是藉以成為掌政者的統治工具，而非今日普遍意義的用法。這種長久通行於中國的文化概念，對本文所討論的十三世紀末文化現象，也有相應之處。

很明顯地，同樣的文化思維方式在十三世紀末依然存在中國，由此來看

〔註9〕〔周〕：《周易》（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頁62。

〔註10〕〔漢〕劉向著，左松超譯：《說苑讀本》（臺北：三民書局，1996年），頁534。

蒙古軍的東征西討，除了是軍力的展現外，也可以看成是文化意義上的判斷與發揚；同樣地，當時的中國華人周達觀對東南亞異域民族的觀察，也存在具有「以己加諸他人」的概念存在。

這種出發點及觀點明顯可見其優越性格，相對也存在其危險性。以優越性格而言，當初周達觀隨團出使真臘，心態上應覺得真臘只是夷狄小國，不及中國天朝之優越。然而，及至抵達真臘，所見又隱約發現事實並非如此，因此，周達觀在心態上可能產生矛盾心理，既佩服卻又不肯承認對方優越，於是只好在其它地方透露自己的優越感。例如周達觀《真臘風土記》第一則「城郭」這麼記載吳哥宮室：

金塔之北可一里許，有銅塔一座，比金塔更高，望之鬱然……所以
舶商自來有“富貴真臘”之褒者，想為此也。〔註11〕

語中顯然帶有敬佩之意，並陳述了真臘的富貴景象。然而，在第十五則「病癩」卻說：

亦有貨藥於市者，與中國之藥不類，不知其為何物。更有一等師巫
之屬，與人行持，尤為可笑。〔註12〕

這段話除反映周達觀在某種文化程度的不理解外，並有批評，且是負面意味的批評。其實，就今日的文化學角度來看，「一等師巫之屬，與人行持」的現象本就是文化的展現成果，不必然沒有價值，但至少在周達觀的年代，類似周達觀的心態、看法的中國人仍所在多有，也就是說，當時對文化定義的認知仍停留在較為狹義的概念。

因此，當我們探討以周達觀為對象的十三世紀末對中國域外的文化考察時，必須留意周達觀很有可能即是站在主觀性的「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角度從事對異域的觀察。以元朝的性格而言，這種觀點也有可能如劉向所說「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這點是後文必須再次探討的地方。

文化的思維決定了周達觀的寫作角度，我們感興趣的地方在於，周達觀在《真臘風土記》一書中，將會透露何種思維？這種思維又多大程度反映了十三世紀末的中國華人思維？以及，《真臘風土記》一書又為我們保留下多少

〔註11〕〔元〕周達觀著，夏鼐校注：《真臘風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44。

〔註12〕〔元〕周達觀著，夏鼐校注：《真臘風土記校注》，頁132。

當時的文化現象？

不過，周達觀寫成《真臘風土記》後，這本著作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元史》中並不記載周達觀的傳記，顯然周達觀在當時並非重要的人物。再以《真臘風土記》一書而言，在傳統典籍的刊印流傳中，也絕非屬於重要的著作。夏鼐先生在《真臘風土記校注》中曾對此書的版本流傳，有簡單扼要的說明：

這書的各種刊本，都有很多缺字誤字。……這書曾有元抄本，但現存最早的本子是明抄本和明刊本。〔註13〕

「很多缺字誤字」已經足以說明《真臘風土記》在刊印學上，頂多只具備普遍的重要性而非絕對的重要性，否則，它不應出現這麼多的缺點。

夏鼐先生並整理《真臘風土記》從古至今的刊本與選刊本、研究本，也只得十五種，〔註14〕這自然呈現了《真臘風土記》的非絕對重要性。因此，我們可以初步認為，《真臘風土記》在中國的學術史、地理志史上，並非極重要著作，相對地，它也沒有得到相對的重視與研究。

相反地，《真臘風土記》成書約五百年後，卻在中國以外的學術界引起相當的重視。公元1819年，法國人雷慕沙（A. Rémusat）根據《古今圖書集成》收錄的版本，將《真臘風土記》譯成法文。其後，著名的法國考古學家伯希和（P. Pelliot）則根據《古今說海本》再譯成新的版本，並且加以註釋，〔註15〕說明《真臘風土記》在法國得到的重視，遠超過在中國得到的重視。

本來，十九世紀初年，中國疲於內政，封建制已近尾聲，學術界也呈現相當的疲弱，相較於歐西考古新興之學，中國顯然缺少較理想的成績。此時，歐西正值近代文明的強大階段，他們不僅將觸角放置歐洲本土，更著眼於東方世界。並且，他們發現了《真臘風土記》，並由此引發改寫近代東方考古史的關鍵報告。除了伯希和外，與《真臘風土記》相關的最著名學者是亨利·穆奧（Henri Mouhot），他根據《真臘風土記》記載，於公元1863年抵達柬埔寨，重新發現書中所記載的吳哥遺址（Angkor），回歐之後發表考察心得，引

〔註13〕〔元〕周達觀著，夏鼐校注：《真臘風土記校注》，頁191。

〔註14〕此十五種版本分別收錄於涵芬樓百卷本《說郛》、明嘉靖年刊《古今說海》、明刊《歷代小史》、明刊《古今逸史》、明重輯《百川學海》、清初重定陶氏重輯《說郛》、清《古今圖書集成》、清乾隆《四庫全書》、清瑞安許氏刊本、清吳昱鳳手抄本、民國王輯《說庫》、馮譯伯希和《真臘風土記箋注》、陳正祥《真臘風土記研究》、清《舊小說》、清《香艷叢書》。見夏鼐《真臘風土記版本考》一文，收於《真臘風土記校注》，頁191～194。

〔註15〕〔元〕周達觀著，夏鼐校注：《真臘風土記校注》，頁3。

發相當的熱潮。今天，吳哥遺址更已成為當今旅遊界的重要熱門區域，被聯合國列為世界遺產保護名單，吳哥寺（Angkor Wat）且被認為是世界七大奇跡之一，〔註 16〕說明了《真臘風土記》直接或間接引起的價值。

《真臘風土記》不只引發亨利·穆奧等人的發現與研究，它更可彌補今日柬埔寨古史的不足。事實上，今日柬埔寨因為古文明沒落，加以近代戰爭頻繁等因素，除了少數石頭碑文仍保存部分史料外，幾乎所有的古史資料均已消失殆盡，而《真臘風土記》則是唯一一部關於古代柬埔寨的書面著作，價值不言可論。

總之，《真臘風土記》一書可以確定擁有以下價值：它呈現了十三世紀時中國華人對域外的觀察角度，並意外成為柬埔寨的唯一重要書面史料，最後並引發當代研究的熱潮，以這幾點而論，《真臘風土記》已足以引發我們高度的研究動機，並對之延伸而來的中、外文化交流現象，作出探討、比對的分析，從中釐清十三世紀末時，中國華人面對異域交流時，內在的思維狀態及外在的交流環境，這均有助於我們還原十三世紀末時的部分文化景象。

第二節 研究方法——文獻整理與實地印證

既然確定《真臘風土記》的價值，在研究方法上，我們必須討論圍繞在公元 1297 年前後的相關資料，包含《真臘風土記》此一文獻文本，及其與當代的印證。此中牽涉的問題主要有二：其一為這段時期前後的文獻記錄，因為這反映了當時的思維方式；其二為今日「真臘」（更具體來說即今日的吳哥）一地的實地印證，因為這反映了古今的差異判別。兩者均有助於我們對十三世紀末中國華人對異域觀察研究的瞭解。

《真臘風土記》成書於十三世紀末，這段時期是中國文明史上對異域觀察研究的一個重要轉關階段，特色在於中國關於域外的著作明顯有增加的趨勢，正如周少川先生在《元代史學思想研究》中說：

域外史專著，如游記、志略等，數量增多。由於元代中外交往的便利，人們心目中無此疆彼界之限，因此，蒙元時期有大批官員、使

〔註 16〕 公元 2007 年之前，吳哥寺一直被世人列為世界七大奇跡之一，但在 2007 年 7 月的重新世界票選活動中，吳哥寺意外被除名，但這項評選，許多人認為並不公允。

者、商人、旅行家西行或遠航，飽覽異域風情，了解外國歷史，他們有不少人秉筆記錄了親歷的所見所聞。〔註17〕

之所以在這個時期有較多的域外觀察著作，顯然與元朝的外拓性格有關。當時，元朝主要的外拓路線基本可區分為三塊：西向、東向、南向。以軍事成績來看，西向的成績最佳，但以對異域的文化探索而言，則南向有更大的成果。如果以十三世紀末的《真臘風土記》為一處轉折，粗略可說本書具有承先啓後的作用。所謂承先，指的是《真臘風土記》在相當程度上整理補充了前代的不足；所謂啓後，指的是啓發了如汪大淵《島夷志略》一類的著作出現；更遠地說，後世著名的明朝鄭和下西洋等事，都或多或少可看成是這一路探索行動的延續影響。

《真臘風土記》所記今日吳哥一帶，即屬於元朝南向探索活動的區域。關於這個區域，中國古史早已有粗略的記錄，公元六世紀時楊衒之在《洛陽伽藍記》中提到一個名為「扶南」的國家：

扶南國，方五千里，南夷之國，最為強大。民戶殷多，出明珠金玉及水精珍異，饒檳榔。〔註18〕

又說：

凡南方諸國，皆因城郭而居，多饒珍麗，民俗淳善，質直好義。〔註19〕

這裡所記的「扶南」，與「真臘」有相當密切的關係，真臘可能即為扶南的屬國，它位於今日東南亞柬埔寨一帶附近。陳序經先生在《扶南史初探》一書中，則認為扶南可能在七世紀中葉時被真臘所滅：

到了六世紀的中葉，其屬國真臘勃興，自己原有的領土，也逐漸為真臘所佔有。……到了七世紀的中葉，扶南雖然還有使者到中國，可是這個時候，土地既有限，可能已成為真臘的屬國。〔註20〕

楊衒之所記的扶南國情況約為公元六世紀時，那時中國紛亂，整體而言並不

〔註17〕周少川：《元代史學思想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頁126。

〔註18〕〔魏〕楊衒之著，周祖謨校釋：《洛陽伽藍記校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卷四，頁174。

〔註19〕〔魏〕楊衒之著，周祖謨校釋：《洛陽伽藍記校釋》，頁175。

〔註20〕陳序經：《陳序經東南亞古史研究合集》（深圳：海天出版社，1992年），頁532。